

叙事学

从刊

【第三辑】

XUSHI CONGGKAN

龙迪勇 傅修延 主编
叶青 副主编

叙事学研究凭借自身理论话语的渗透，在国内外学术界成为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共有的概念和共同关心的话题。本书是在南昌召开的“首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三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3篇，内容涉及中国叙事传统、空问叙事、跨媒体叙事等几个领域，内容涉及中国叙事传统、空问叙事、跨媒体叙事等几个领域，内容涉及中国叙事传统、空问叙事、跨媒体叙事等几个领域。同时还有对中外叙事学发展的理论前沿的概括与引进以及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反思的讨论等。叙事学研究凭借自身的理论活力与学科渗透，在国内学术界成为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共有的概念和共同关心的话题。本书是在南昌召开的“首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三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3篇，内容涉及中国叙事传统、空问叙事、跨媒体叙事等几个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叙事

丛刊

【第三辑】

XUSHI CONGKAN

龙迪勇 傅修延 主编
叶青 副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叙事丛刊 (第三辑) / 傅修延主编 龙迪勇、叶青副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004-9266-5

I. ①叙… II. ①傅… ②龙… ③叶… III. ①叙述—文学
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I04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1955 号

责任编辑 杨晓芳
责任校对 崔冬梅
封面设计 久品轩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80

定 价 42.00 元

学术顾问(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申 丹 杨 义

主 编 傅修延

副 主 编 龙迪勇 叶 青

编 委 (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董乃斌 傅修延 胡亚敏 龙迪勇 乔国强

申 丹 谭君强 夏汉宁 杨 义 叶 青

余 悦 赵剑英 赵毅衡

编 辑 胡颖峰 肖惠荣

目 录

空间叙事

- 历史叙事的空间基础 龙迪勇 (3)
- 记忆的空间性及其对虚构叙事的影响 龙迪勇 (47)
- 朝向空间的叙事理论 [美]卓拉·加百利 李森译 (93)
- 礼经建筑空间的元叙事技巧及其影响 张世君 (119)
- 对写实与图像叙事关系的再思考
- 兼论“分科而习”传统对中国画叙事特征的影响 叶青 (139)
- 诗歌叙事中的空间标识
- 以《唐璜》为例 杨莉 (153)

中国叙事传统

- 试论《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 傅修延 (167)
- 中国思想中的道德叙事发微 赖功欧 (194)
- 真实的虚拟世界
- 先秦文学中的移位叙述 张丽 (205)
- 试析江西武功山地区民间故事的叙事特征 刘荷香 (216)

理论探讨

- 文学史：一种没有走出虚构的叙事文本 乔国强 (229)

叙事建构身份

- 以《西游记》为例 赵苗 (245)

试论叙述者的不可靠性

- 以《押沙龙,押沙龙!》为例 肖惠荣 (268)

- 影视广告叙事分析 齐婕 (282)

文本解析

- 《最后的常春藤叶》的叙事策略 万芳 (295)

- 试析《记忆碎片》中的不可靠叙述 徐亮 (303)

- 试析电影《回到未来》的叙事策略 刘燕 (311)

对 话

感受作家的叙事体验

- 与著名作家陈世旭谈叙事 肖惠荣 张泽兵 (321)



空间叙事

历史叙事的空间基础

□ 龙迪勇

长期以来，历史仅仅被看成一种时间维度上的叙事文本，似乎历史是与空间并不相涉的一种抽象性、孤立性存在。可事实上，空间不是历史的可有可无的要素，而是构成整个历史叙事的必不可少的基础：那些特定历史时代残存下来的器物、废墟及其图像之类的空间性存在物，不仅可以成为历史的证据，还给史学家的历史叙事行为提供了动机；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必然发生在具体的空间里。因此，那些承载着各类历史事件、集体记忆、民族认同的空间或地点便成了历史的场所；要使历史更贴近事件的原始存在状态，史学家便应该在空间维度上进行编排和创造，赋予历史事件一种空间性的结构。

尽管“有多少历史学家就会有多少种历史定义”，^① 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古老的叙事形式，历史总应该包括空间、时间、事件、人物等基本要素。而且，尽管历史是凝固时间、保存记忆、探究往昔的一种形式，但历史总是生活在某一个地方上的人物、发生在某一个空间内的事件的历史。托雷斯·维也加斯说得好：“没有地理的历史，是一幢没有地基的建筑。”^② 事实

^① [美] 唐纳德·R. 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寻》，陈恒、宋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10 页。

^② 转引自巴塞罗那大学教授埃内斯特·卢奇为西班牙学者胡安·诺格的《民族主义与领土》一书所写的“序言”，徐鹤林、朱伦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 页。

上,“希腊史学的兴起发展与地理研究是紧密相关的”。^①显然,不考虑空间维度的历史文本,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可能存在的。说起来,历史就像是在舞台上上演的一幕活剧,历史学家必须要有一个舞台,才能真正把这幕活剧演好。“希罗多德的历史舞台是三个大陆之间的血腥屠杀的连接点(东南欧洲、小亚细亚和西北非洲);波利比阿的‘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主要是罗马帝国征服和扩张史……因此历史总是‘地缘历史’,历史学家总是尽量使所评述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相关联,这种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借此可确定并使它与人类的其他地区相区别。可以用传统的比喻说,历史在一个巨大的‘自然剧场’(theater of nature)里上演……”^②事情还不止于此:历史叙事的“空间性”不仅仅体现在人类行为(事件)的地理空间(“自然剧场”)上,它还体现在历史的证据、叙事的动机以及历史的结构等多个方面。然而,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无论是历史写作者还是历史研究者,却总是把思考的重心放到了时间上,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空间,以至于“当今历史已与时间顺序结成了联盟”,^③历史似乎仅仅被看成一种时间维度上的叙事文本。翻开各种史学理论、历史哲学类的著作,涉及空间维度的论述简直是少之又少,似乎历史是与空间并不相涉的一种抽象性、孤立性存在。更有甚者,某些思维极端的人甚至把空间看做历史和时间的敌人。米歇尔·福柯在1976年的一次访谈中就已经谈到过人们“对空间的一贯的贬损”现象: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空间被看做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不动的。相反,时间代表了富足、丰饶、生命和辩证”,“对于那些把历史与旧式的进化、生存的连续性、有机发展、意识的进步或者说存在的规划混为一谈的人,对空间术语的使用似乎具有一种反历史的味道。如果我们用空间的术语来谈论历史,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时间充满敌意”。^④这当然是片面的、错误的,也是与“历史”的事实不相符的,

① [意]莫米利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冯洁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页。

② [美]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寻》,陈恒、宋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13页。

③ 同上书,第11页。

④ 米歇尔·福柯:《权力的地理学》,载《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页。

因为事实上，空间既不是历史的可有可无的要素，更不是历史的“敌人”，而是构成整个历史叙事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本文所要探讨的，即是史学研究中非常重要却又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历史叙事的空间基础问题。

一 历史的证据与叙事的动机： 古物、废墟与图像

那些特定历史时代残存下来的器物、废墟及其图像之类的空间性存在物，对于历史叙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除了可以成为历史的证据，它们还给史学家的历史叙事行为提供了动机。

首先，器物、废墟及其图像之类的空间性存在物可以给历史叙事提供有力的证据。无疑，在历史研究中，某些古代遗存下来的实物有时会成为某些历史事实的佐证，有时则会改变某些长期以来被视为“事实”的传说。对此，英国图像学研究者哈斯克爾曾经这样写道：

当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获悉特纳鲁神庙（Temple of Taenerum）留存有一件由阿里翁（Arion）献祭的骑着海豚的小型青铜男像时，他对科林斯人（Corinthians）和雷斯波岛人（Lesbians）讲述的一个故事的真实性就更有信心了——故事说那个著名的歌手和作曲家曾逃脱了他那艘船上的水手的蓄意谋杀，并被一条喜欢音乐的海豚从海中救起。与此相反，当他在埃及时又否定了（约2000多年前的）传说。这个传说是：凯奥普斯（Cheops，埃及第四王朝的国王）的儿子美西努斯（Mycerinus）玷污了自己的女儿。他之所以否定这个传说，部分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二十个裸体巨型木雕人像”，据说这些人像代表那些仆人，他们因为疏忽大意而让国王接近了这个姑娘，故而被罚斩落双手。事实上，他看到的这些手“仅仅因为年代久远而掉落在了地上。它们仍在那儿，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就落在雕像脚边的地上”。^①

^① [英] 哈斯克爾：《历史及其图像》，孔令伟译，载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编《艺术史与艺术理论 I》，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60页。

当然，可以作为历史证据的东西很多，正如年鉴学派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所说：“历史的证据其类型之多简直不胜枚举。一个人的言论文字、所制造的产品以及接触过的东西，都可以也应当能够使我们对他有所了解。”^①但概括起来，历史的证据无非两类：一类为各种文字性作品，另一类则是各种实物。实物之所以能用来建构历史，是因为它们同样可以很好地再现过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人类早期历史上的雕塑和木刻以及后来的石头建筑，比如金字塔、宫殿、寺庙或者教堂，都承载着关于过去、关于王朝序列和帝国规模的信息。可以通过建筑物的实际年代、构造物内部的空间关系，以及关于国王和神祇、妖魔和战斗的描述，来再现过去。”^②而且，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实物证据甚至比文字性证据更为可靠，马克·布洛赫就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只要将洛林或尼布尔所著的罗马史与当今一些简短的罗马史论文加以对比，就可以看出，前者的大部分史料取自李维、苏托尼亚斯和弗洛鲁斯，后者的主要依据是古代的铭文、纸草文书和古币。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重新完整地揭示历史的横断面。”^③对于实物证据的种类或范围，我国史学理论家杜维运在其名著《史学方法论》中这样写道：“从文字记载的史料，扩展到非文字记载的史料，是史学的一大进步。此类史料，可概称为实物或遗迹，如山脉、河流、城塞、宫院、陵墓、道路、遗骸、里程碑、方向石、纪念品、美术玩赏品，等等，不胜枚举。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都是这方面极为驰名的史料。即小至秦尺汉石、唐宋鱼符，无一不是史学家的瑰宝。”^④而且，这些实物史料不仅可以成为一些史实的有力证据，还可以成为某些假言陈说的“反证”，比如关于清代香妃之死，很多人都认为是被太后赐死的，可萧一山经过考察实物证据后却推翻了这一说法：“香妃入宫侍高宗垂三

^① [法]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② [英] 杰拉德·德兰迪、恩斯·伊辛主编《历史社会学手册》，李霞、李恭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3页。

^③ [法]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④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十年，而野乘所载谓为太后赐死，今所留回营、浴室、戎装小影、行乐之图，均可为之反证。余如坛殿之规模，两堂之史料，西陵之地宫，赵县之石桥，以至清宫珍玩、銮仪、卤簿、红夷巨炮、九品顶服、甲仗祭器、雕塑壁刻、锦绣之文、彩素之作，无一不足为吾人之资料。广搜博采，成就斯宏。”^①显然，如果不依靠那些实物证据，那么关于香妃之死的真相，恐怕就永难浮出水面了。

在中国，一种特殊的古物——碑铭在历史建构中一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为某人某事立碑是比文字记载更重要的生产意义、从而进入历史的行为，正所谓“树碑立传”是也。艺术史研究者巫鸿说得好：

从一开始，立碑就一直是中国文化中纪念和标准化的主要方式。若为个人修立，则或是纪念他对公共事务的贡献，或更经常的是以‘回顾’(retrospective)视角呈现为死者所写的传记。若由政府所立，则或是颁布儒家经典的官方版本，或是记录意义非凡的历史事件。总之，碑定义了一种合法性的场域 (legitimate site)，在那里‘共识的历史’(consensual history) 被建构，并向公众呈现。当后世的历史学家研究过去的时候，碑自然便成为历史知识的一种主要源泉，上面的碑铭为重构过往时代中的晦涩事件提供了文字证据。^②

当然，由于碑的特殊性——由于碑往往为官府或宗族所立，具有相当的公共性，所以一般不允许被弄回家中收藏；另外，由于碑往往很大很重，所以也不便于收藏——因此体现其历史价值的物质载体总是被转化成一种便于携带、收藏和使用的形式，即拓片。正如巫鸿先生所指出的：“石碑虽然也为当时古物研究者所重视，但却没有像古铜镜、古玉器和古书画那样被收藏——实际被收藏的是刻在上面的那些直接包含历史信息的铭文（后来也包括雕刻的图像）。因此，一方沉重的石碑就必须被转化为类似于印刷品或便

^① 萧一山：《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学林》1942年第3期。

^② [美] 巫鸿：《废墟的内化：传统中国文化中对“往昔”的视觉感受和审美》，载《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7页。

携式图画物质形式——也就是‘拓片’。”^① 有了拓片，学者们就不必到古物（石碑）“现场”而是只坐在书房里就可以进行相关研究了。^② 于是，“石碑虽然留在原地没有移动，但是学者书房里进行的脑力生产无疑丰富了它们的意义。有意思的是，虽然碑铭拓本的每一个细节都因其历史信息的价值而被仔细研究，荒野中的石碑却作为一个整体而开始获得宏观历史的象征意义（symbolism of history）。似乎石碑那沉默但雄壮的形象赋予了‘往昔’一个抽象剪影和含义——它象征了历史知识的源头，因此便也象征了历史的权威”。^③ 可见，尽管石碑上的文字具有相对独立的历史意义，它们可以脱离石碑本身进行收藏和研究，但只有作为古物的石碑整体才是“历史知识的源头”，才“象征了历史的权威”。

在中国，利用古物来研究历史的做法于宋代开始走向成熟，并正式形成了一门古器物学，正如张光直所指出的：“古器物学，作为传统的历史学的附加成分，形成于宋代。”^④ 宋代出现了不少著录古器物的著作，“宋代的著录，既收有器形的摹绘、款识的拓片，又有器物的外部特征和大小尺寸的描绘，开创了著录宫廷和私家收藏青铜器的古器物学传统。宋代的著录，还开创了用古代典籍中的术语命名器物及其纹饰的传统”。^⑤ 当然，“这些著录的主要目的，不是建设一门作为历史材料的独立范畴的基于对古代遗物研究的新学问”，^⑥ 对它们的使用，必须与对文献的使用结合起来，“古代的器物名

① [美] 巫鸿：《废墟的内化：传统中国文化中对“往昔”的视觉感受和审美》，《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47 页。

② 当然，不能否认有些学者会到“现场”去实地考察，但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正如巫鸿所说：“像欧阳修和赵明诚（1081—1129）这样的金石学家确实去‘现场’（in situ）走访过一些碑，但这类寻访在北宋时期并不常见，且常常局限在他们旅程附近或供职地区的周边。找寻那些前人不知道的金石摹拓才是他们真正热情所在。”（见《废墟的内化：传统中国文化中对“往昔”的视觉感受和审美》一文，载《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48 页）

③ [美] 巫鸿：《废墟的内化：传统中国文化中对“往昔”的视觉感受和审美》，《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48 页。

④ 张光直：《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4 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

称蕴藏着许多重要的信息，对它们的任何研究都必须与古代的文献结合起来”。^① 这种把古器物与相关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方法，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显著特色——任何有价值的历史研究，都必须是运用器物与文献相结合的“两重证据法”而进行的研究。张光直说得好：“这种可称为文化相对性（emic）的研究方法，大约只有中国考古学具备，因为只有中国才拥有大量可资利用的文献材料。中国古代的礼器种类繁多，名目复杂。有些名称就刻铸在铜器上，但是，更多的则是在古代文献里。比如‘鼎’这个名称，就刻铸在许多鼎类的器物上。不过，作为古代最重要的礼器，它也见于许多古代文献。实际上，‘鼎’字本身，即是鼎这类三足器的象形。因此，用鼎这个词指代那种特殊形式的器物，就像宋人的著作所做的那样，和古代中国人的用法是一致的。”^② 这种把器物用于和文献相互参证的做法，当然构成了宋代乃至中国古器物学的主流，“不过，宋代考古学家也试图做一些别的方面的工作，而不是仅仅协助历史学家”。^③ 比如说，吕大临在其《考古图·序》中谈到了金石学的三个目的：“探制作之原始”、“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④ 刘敞则在其已失传的著作《先秦古器记》的“序”里，认为对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⑤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中国古器物学其实也有着不甘于成为“历史学的附加成分”的内在要求。宋代之后，中国的古器物学有所衰落，这主要表现在：“宋代以后的古器物学著录和著作，专注于铜器铭文及其与文献的关系，而在宋代记录甚详的许多信息，比如器物的出土地、特征以及大小尺寸，等等，则很少受到重视，或根本不予描述。”^⑥ 一直到清代，传统的古器物学才再一次复兴。进入 20 世纪，在西方“田野方法”的影响下，中国的古器物学进一步发展成了现代考古学。

① 张光直：《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9 页。

② 同上书，第 18 页。

③ 同上书，第 14 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第 15 页。

⑥ 同上。

在西方，古器物研究一般被称为“古文物研究”、“博学研究”或“考古学研究”，而研究这些器物的人则被称作“古文物学者”。当然，这种称呼并不存在统一性，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因为确切地说，“在古代并没有一个综合词汇来描述我们称之为古文物研究的领域，尽管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这个概念还有几个模糊的表达词，例如‘能判断的’、‘喜欢研究的’、‘学问渊博的’、‘关于语法的’‘教授’、‘博学’、‘学者’等。最相近的是柏拉图用过的‘古代研究’一词。据柏拉图的《大希庇阿斯篇》记载（285D），诡辩派哲学家希庇阿斯说，英雄和人的谱牒、城市建造的传统、城市以其命名的地方行政官的名单等都属于一种称为考古学的学科。……柏拉图证明了在公元前5世纪或公元前4世纪一些类型的历史研究是称为考古学，而非历史学的。公元前4世纪后，这个便利的词便不大用到了。“考古学”这个词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被用来表示一部古代历史作品或追源溯流的历史”。^①“古文物研究”的主要特色，是利用钱币、铭文、石碑等过去时代流传下来器物对“古代”的各个方面进行静态、系统而非动态、线性的描述，诚如意大利著名古典学者莫米利亚诺所说：“古文物学者喜欢互不相干和模糊不清的事情，但是隐藏在这些单个、似乎毫无联系的事实背后的却是神秘而又庄严的古代。所有的古文物学者都心照不宣，知道他们必须为古代这个画面添加一些东西，将其付诸实践，这就意味着去收集具体事实，并将它们放置一旁，以备将来可以统一审视这些制度、风俗和崇拜仪式，而钱币和铭文则被认为是这些具体事实最重要的证据。古文物学者的思绪的确在单个事实和统一审视之间犹疑不定，如果确实进行统一审视的话（并不经常发生），结果绝不会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著作。古代是静止的：它要求对于古代制度、宗教、法律和金融进行系统的描述。”^②根据莫米利亚诺的研究，“古文物研究”的兴起其实与古希腊历史研究的“典范”迁移有关。众所周知，希罗多德是古希腊第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有“历史之父”之称。希罗多德兴趣多样、游历广泛，其历史研究不仅涉及多个区域、多个时代，而且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① [意] 莫米利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冯洁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9页。

^② 同上书，第76—77页。

面，其历史叙述手法也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如果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希罗多德的历史也许可称为“文化史”或“整体史”。希罗多德在其有生之年为了收集史料而到处游历，所以其历史还牢牢地奠基于空间（地理）基础之上。事实上，“他的世界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世界地理著作；两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的”。^① 在古希腊的时候，还没有后来所谓的学科意识，^② “希罗多德之所以被认为主要是历史学家，是因为当时历史学者要多于地理学者，事实上他著作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地理方面的内容”。^③ “实际上，希罗多德具有这种思想，即所有的历史必须用地理的眼光去看待，同时所有的地理必须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地理学提供了自然背景和舞台，只有与地理相联系，所有的历史事件才有意义。”^④ 而且，为了完整地保存“往昔”，哪怕是在各地听来的传说和神话，希罗多德也照样收录在其《历史》一书之中，^⑤ 因此其“书中包括他对所旅行过的地区的描述，他所观

① [美] 杰弗里·马丁：《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5 页。

② 正如杰弗里·马丁所指出的：“在公元五世纪，没有人将自己局限在某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内。那个时候，没有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或者天文学家的说法，甚至没有专业的学术团体可以加入，也没有专业的学术机构。”（《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5 页）

③ [美] 杰弗里·马丁：《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5—26 页。

④ 同上书，第 26—27 页。

⑤ 当然，对这些神话和传说，希罗多德保持了必要的警惕性，“他知道自己的任务是双重的：保存传统是必要的，而发现传统的真相也是必需的。他意识到诗人歌颂过从来不曾发生过的事件，他不准备让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获得永生”（莫米利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第 44 页）。为此，希罗多德发展出了一种批评手法，以检验所写事件的真实性，这样一来，他一方面“记录没有被书面记录过的事件和传说”，另一方面则“将自己批评的范围扩展到检查非常古老的和比较近期的、希腊的和外国的”（同上书，第 44 页）。可是，“希罗多德采用的批评手法从来都不是非常严密的，用它来处理各种传说，它自然会变得越来越不严密。当希罗多德开始询问希腊和非希腊传说的作用时，他那简单的比较手法几乎不太恰当。当他必须面对外国神话时，他发现要将传说的故事变成普通人的语言也不是那么容易。另外，他也缺乏怀疑的热情，他克制自己没有去说一些话，因为那样说会冒犯神”（同上书，第 44—45 页）。正因为如此，所以希罗多德记载的某些事件常被人们视为不真实，而这也正是希罗多德为人所诟病的主要原因。“但是，希罗多德的遭遇从来没有在修昔底德身上发生过：有些人欣赏希罗多德的风格，却宣称他会撒谎，而那些大量采用过修昔底德的人则不会宣称他不可靠。”（同上书，第 58 页）